



“华山玫瑰燕山龙”与“良渚琮璧海岱城”

——苏秉琦区系类型理论的新思考*



李新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苏秉琦 1981 年正式提出“区系类型”模式^①，很多学者认为其主旨在于建立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赞之者认为该文是“对我国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具有奠基意义的重要文章”“是苏秉琦先生几十年来运用类型学方法研究各种考古遗存的必然结果”^②，“标志着中国考古学文化谱系建设初具规模”^③。持异议者认为：“考古学文化的分区和系统，是考古学研究中的常用手段，并不具有什么新的含义。”^④如笔者曾经讨论过的，1949 年以后，面对日益丰富的考古资料，建立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确实自然成为史前考古学的基本任务，经过三十年的努力，至 20 世纪 70 年代，安志敏^⑤和夏鼐^⑥依据碳十四年代全面讨论各地区文化序列，时空框架已经基本确立，各位学者阐述的框架并无本质差别^⑦。苏秉琦在文中确实倡导“各地同志应立足于本地的考古工作，着力于把该地区文化面貌及相互关系搞清楚”；区系类型模式提出后，也确实极大促进了时空框架

的建设。但是，该模式真正的重要性不在于第一次把异彩纷呈的考古学文化梳理出了头绪，而在于对已有时空框架提出一种不同于“中原中心”模式的新解读，其核心是强调各区系发展道路的独立性，指出它们“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否定中原地区的领先地位，认为各地区之间“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

但此模式在摆脱了“中原中心”模式深陷的“大一统”怪圈的同时，也引发一个问题：各地区文化发展被“庖丁解牛”之术分割为“满天星斗”的独立进程，又没有中原地区“先进”文化的引领和凝聚，整个中国文明起源进程是否还可以被当做一个“全牛”看待？或者说是否还存在一个可以用“中国”命名和叙述的文明化进程？苏秉琦的答案无疑是肯定的。早在 1979 年 4 月“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及中国考古学成立大会”上，他就指出考古学“必须正确回答下列诸问题，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等”。“这样我们就有可

* 本研究得到中华文明探源研究(2019—2022)资助。

能对‘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做出自己更多的贡献”。把中国境内的史前文化当作一个整体，以考古学研究论证历史时期中国的史前基础，为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奠定基础正是他努力追求的目标^⑧。

为此，苏秉琦提出了一种文明因素在不同地区间持续传递、发展的模式，以强调各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密切联系和一体性，并将其凝练为那首著名的绝句：“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甬与瓮。汾河岸边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具体而言，“距今七千至五千年间，源于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通过一条呈‘S’形的西南—东北向通道，沿黄河、汾河、和太行山麓上溯，至山西、河北北部桑干河上游至内蒙古河曲地带，与源于燕山北侧的大凌河的红山文化碰撞，实现了花与龙的结合，又同河曲文化结合产生三袋足器，这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在距今五千至四千年间又沿汾河南下，在晋南同来自四方（主要是东方、东南方）的其他文化再次结合，这就是陶寺”。陶寺文化又开启了此后夏商周三代的文明化进程。

苏秉琦高度评价这一互动过程，指出“从中原到北方再折返到中原这样一条文化连接带，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六千年到四、五千年间中华大地如满天星斗的诸文明火花，这里是升起最早也最光亮的地带，所以，它也是中国文化的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这一“直根系”具有“花”和“龙”两个文化元素，陶寺又具有“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地位，“使我们联想到今天自称华人、龙的传人和中国人”，因此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具有核心地位^⑨。

这一充满诗意的“文明火炬接力”式的模式提出了两个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的要点：一是各地区文明进程要在一个更大的无先进“中心”引领的文化互动的背景下去解读；二是不同时期最强大的政治

组织都是在吸取前人政治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样的此起彼伏的进程一直持续到夏商周三代时期。本文拟试对此进行阐发。

二

史前时代各地区文明进程要作为一个整体在广大的文化互动的背景下解读是中国考古学界的共识，争执之处在于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互动是否有一个“先进”核心的引领和推动。

1959年，安志敏提出：“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大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相同，它的发生和发展也推动和影响到了邻近地区的古代文化，如长江流域以及边疆地区的古代文化遗存都与黄河流域有着密切的联系。从黄河流域考古学上所提出的各项证据，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上是有重要意义的。”^⑩石兴邦也同时指出：“黄河流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中心地区，历史上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以这一地区为核心的。黄河流域考古学上主要问题的解决，直接间接地有助于其他地区历史问题的解决。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居民与边疆及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古代民族的活动，就拧结成了一条紧密的历史纽带。”^⑪这一被称作“中原中心”的模式强调黄河流域的领导作用，其描述的各地区关系不是平等的互动，而是“先进”的黄河流域文化的引领和传播。

严文明在1987年提出的“重瓣花朵”模式认为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因为位居花心，“易于受到周围文化的激荡和影响，能够从各方面吸收有利于本身发展的先进因素，因而有条件最早进入文明社会”^⑫。仍赋予中原地区特殊的核心地位，其所描述的各地区关系也未着眼于平等互动，而更加关注中原对各地区先进因素的吸收。

1986年张光直借用美国学者葛德伟(Joseph R. Caldwell)讨论美国东部印第安人文化时使用的相互作用圈(Sphere of Interaction)概念,提出在公元前四千年前后,形成了范围北自辽河流域,南到台湾和珠江三角洲,东自海岸,西至甘肃、青海、四川的相互作用圈,因为“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可以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国”^⑮。此模式与“区系类型”模式同样强调各文化区的无中心引领的平等的、交叉网络式的互动,同时强调这样的互动是足以成为将各地区凝结为一个整体的纽带,并明确定义了“最初的中国”的概念。笔者在此基础上,对如何以考古学方法认定“最初的中国”进行了讨论,认为“最初的中国”是以多元互动的视角解读中国文明形成的最佳模式^⑯,这可以视为苏秉琦倡导的区域间平等互动模式的发展和完善。

以“最初的中国”的视角观察,庙底沟—红山—河曲地区—晋南这样的徘徊于苏秉琦所说的面向内陆的西部地区的文化传承,显然不足以充分反映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更复杂也更壮丽的激荡互动。

庙底沟类型和红山文化所处的距今6000年至5300年时期,是中国史前时代灿烂的转折期。在黄河下游,时值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随葬品丰富的大型墓葬开始出现。大汶口墓地M2005随葬品共计104件^⑰。在长江下游,安徽凌家滩遗址出现祭坛、积石圈和随葬大量玉器和石器的大型墓葬,其中07M23出土随葬品330件,包括玉器200件,有长72厘米,重达88公斤的玉猪^⑱。江苏东山村遗址发现目前崧泽文化的最高规格墓葬,其中M91随葬品38件(套),包括14件玉器^⑲。在长江中游,湖北大溪文化晚期龙王山墓地墓葬等级差别明显^⑳。在辽西地

区,红山文化的发展达到顶峰,出现辽宁牛河梁遗址群,在方圆50平方千米的“圣地”内,集中分布着祭坛、冢墓和“女神庙”,大型墓葬随葬品有特殊内涵的玉器^㉑。在“中原地区”,河南铸鼎原周围的系统聚落调查显示,最大的北阳平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次一级的中心性聚落西坡遗址面积40多万平方米,聚落呈现明显的等级化。西坡遗址核心部位的发掘和对整个遗址的系统钻探表明,遗址中心位置很可能存在一个广场,广场的四角都有大型半地穴房屋。西北角的F105室内面积约200平方米,外有回廊,占地面积达500余平方米;西坡墓地的34座墓葬等级差别明显^㉒。

庙底沟和红山社会的发展只是各地区普遍发生跨越式社会发展浪潮中的一部分,庙底沟类型彩陶虽然影响颇广,但正如笔者所述,彩陶只是当时被广泛交流的多种文化因素之一而非全部。庙底沟风格彩陶的广泛传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易于被模仿,可以被应用于日常生活的特性,似乎并不完全归功于庙底沟类型的超前发展、超强实力和核心地位^㉓,各地区的发展主要是苏秉琦所说的自身“裂变”的结果,而非外力的推动或引导。

各地区的复杂社会具有不同的特征^㉔。红山和凌家滩社会大量使用具有特殊内涵的玉器,宗教权力明显占有更重要的地位,红山文化更是形成了牛河梁这样的仪式活动中心。大汶口文化高等级墓葬随葬品丰富,但以表达世俗身份和财富的精美陶器、饰品和猪下颌骨等为主,缺乏特殊玉器等宗教仪式用品;崧泽文化和大溪文化与之相似。庙底沟类型社会中,大型墓葬规模大,但随葬品少,同时存在大型聚落和大型公共建筑。这样的差异性各地区独立发展的有力证据。庙底沟社会尤其独树一帜,各地区明显并未接受其发展方式,红山社会的强烈宗教倾向尤其与之格格不入,虽然红山彩陶具

有与庙底沟近似的时代风尚,但很难因此推测庙底沟的社会发展模式对红山独特的社会复杂化道路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各地区同步发展同时,区域间交流互动也进入了新的阶段,确实因“彼此密切联系”而形成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逐渐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各地区新涌现的社会上层为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威望而构建的社会上层交流网、以之为媒介的礼仪用品和高级知识的交流应是促成各地区一体化和“最初的中国”形成的更重要的推动力^⑧。庙底沟类型和红山文化的“碰撞”只是此范围广大的交流网的局部火花^⑨。

与“花与龙的结合”这样的诗意描述相比,红山文化与相隔一千余公里的凌家滩遗存在玉器上表现出的深度相似是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的更坚实的证据。归纳起来,相似的玉器种类包括玉人、写实玉龟、龟的抽象表现形式玉筒形器、红山文化玉猪龙和凌家滩玉龙、双联璧、玉环、玉镯、玉璧、石钺、凌家滩胸负八角星、双翅为猪首的玉鹰与红山文化“梟形勾云形器”、凌家滩“兔形器”与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所出回首玉鸟。在与宗教观念相关的玉器中,玉人头戴矮冠、双手回放在颌下、腰束窄带、双膝微曲这些细节都酷似,玉筒形器在斜口、象征龟腹甲的一面较平整、象征龟背的一面凸起等细节上也相似。龟、鸟、猪等虽然表现方式有差别,但蕴含着相似的内涵。红山和凌家滩社会也是各地普遍出现的复杂社会中最具宗教倾向者,明显具有更多相似性。因此,红山社会的发展,主要是辽西地区自身发展产生的“裂变”,是本地传统基础上的创新^⑩,外来因素方面则更多是得益于与凌家滩社会的交流,与庙底沟类型的“碰撞”可能只是起了次要的作用。

三

约距今 5300 至 5000 年之间,中国史前时代进入动荡整合期。

强大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核心区豫西、晋南和关中盆地地区遗址大量减少^⑪,庙底沟人群向北迁移直至河套地区,形成海生不浪等地方文化;庙底沟人群向西则越过陇山,进入此前人口稀少的黄河上游的洮河和湟水流域,直达河西走廊的东部,形成以绚丽彩陶为特征的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人群还通过甘南进入四川盆地西北地区,对该地区的后续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也发生了明显的衰落,遗址数量急剧减少,宗教中心牛河梁被废弃,发生了向西直达河套地区的人群移动^⑫。

庙底沟和红山文化的“衰落”造成的人群移动,促成了整个中国二级阶地黄土地带直至川西北的大范围文化互动,促进了各地区的文化发展,扩大了“最初的中国”的地理和文化范围。西北地区的文化发展,更是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位居东南的一级阶地地区,各地区文化持续发展。大汶口文化进入其中期,大型墓葬显示社会复杂化继续发展。大汶口文化人群的“西进”是该时期的重要事件。考古发现显示,大汶口文化因素已经直达洛阳盆地,出现在河南偃师地区;西南方向的皖北地区已经完全成为大汶口文化的势力范围,出现安徽尉迟寺遗址等核心聚落。颍水中上游为大汶口人群集中地区,故该地区 and 伊、洛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被命名为“颍水类型”^⑬,南阳盆地和鄂北地区也可以见到大汶口文化因素,可见其影响力之广泛。随着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势力的解体,在此西进浪潮的影响下,河南东部地区迅速“东方化”,为河南龙山文化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在长江中游,大溪文化的重心向东迁移,在汉水中游形成屈家岭文化,出现城址群^⑭。湖北城河遗址最新发现结构复杂、随葬品丰富的大型墓葬,显示了该文化的高度发展^⑮。屈家岭文化的“北进”同样是该时期的重要事件,屈家岭文化因素进入南阳盆地、

鄂北,其影响力直达晋陕豫交界地区和关中地区^③。

在长江下游,良渚文化整合了凌家滩遗存和崧泽文化的人口、经济、政治和宗教资源,形成了中国史前时代第一个超级强大的政治和宗教中心。该文化的核心区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内^④,发现面积近300万平方米,内有人工堆筑的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为高等级建筑区^⑤。遗址群中的反山^⑥和瑶山^⑦墓地中,发现随葬精美玉器、象牙器、精致陶器和漆木器的高等级墓葬,这些器物上有反映复杂宗教观念的神人兽面等精细刻画的图像和复杂的符号。茅山遗址发现大面积稻田遗存,反映了水稻农业的高度发展。此外,发现规模庞大的水利设施,包括阻挡山洪的土筑水坝和引水渠道,水利调节面积达100平方千米以上^⑧。良渚文化分布的环太湖地区,有上海福泉山^⑨和江苏寺墩^⑩等次级中心和大量中小型聚落,形成清晰的聚落等级。在此广大范围内,以玉器为核心的宗教和信仰即礼制系统具有广泛的一致性。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文明”阶段,形成了相当于早期国家的高级政体。

庙底沟类型人群的北上确实可能“同河曲文化结合产生三袋足器”,红山文化及其后的小河沿文化或雪山一期文化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文化也有相似因素^⑪,但由目前的资料看,整个内蒙古中南部和河套地区虽然有庙子沟那样的大型遗址^⑫,准格尔旗黄河南流地区^⑬和大青山南麓东流黄河北岸^⑭都发现有聚落群和大型石构建筑,但并无超过庙底沟类型和红山文化的社会发展程度的明确考古证据。

真正接过红山文化“文明火炬”的应该是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的继承关系已多有学者论及^⑮。凌家滩社会在距今5300年前后良渚文化兴起之时突然衰落,其所在地区良渚文化时期成为几乎没有遗址

的空白地带。而良渚遗址群所在区域在崧泽文化时期并无高等级聚落,当时的文化中心在太湖东部。良渚文化最具创意的玉器琮与凌家滩玉版的密切关系,良渚文化神人和凌家滩玉人冠帽和面型的相似、以玉器为主要随葬品的葬俗等也都显示与凌家滩密不可分的联系^⑯。因此,这样的此起彼伏应该不是巧合,提示了凌家滩人群向良渚遗址群地区的移动可能是促成其快速成为强大中心的重要原因。调查表明,从芜湖到宣城、湖州一线分布着众多崧泽文化晚期遗址,凌家滩经太湖南部到余杭的通道畅行无阻^⑰。

以宗教力量凝聚广大区域的社会集团的先例是红山文化开创的。考虑到凌家滩和红山的密切关系,可以肯定红山文化的社会实践对良渚的早期国家构建、尤其是对大范围社会组织的凝聚和控制产生了示范作用。但良渚社会的领袖们并没有照搬红山模式,完全依赖宗教权力,建立与世俗隔绝的宗教圣地,而是延续凌家滩宗教和世俗并重的传统,得以兼顾崧泽文化的世俗传统,成功完成超越前人的建立早期国家的宏大政治实践。

直接将红山文化的“燕山龙”传统发扬光大的应该是良渚文化的“琮璜璧钺”。

四

上述河曲地区形成的新文化因素确实如苏秉琦所说“在距今五千至四千年间又沿汾河南下,在晋南同来自四方(主要是东方、东南方)的其他文化再次结合,这就是陶寺”。但陶寺复杂社会形成和发展主要是良渚社会衰落后引发的社会变革浪潮的结果,更多得益于与海岱和河南诸城林立的龙山文化的交流。

距今4300年前后良渚社会的崩溃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开启了其后约500年的中国早期王朝形成的有力程序。良渚衰落造成影响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在“最初的中国”范围

内良渚风格衍生的玉器广泛流行。除了琮^④和璧^④的扩散外，鸟负神兽主题的流传和发展更加引人注目^④。

在山东龙山文化遗物中，日照两城镇采集玉圭^④和台北故宫藏玉圭^④上均有以此为主题的刻画图像。山东临朐西朱封遗址墓葬M202:2透雕簪顶饰顶为“介”字冠和其下简化的双翼，表现抽象的飞鸟，主体为旋目兽面，良渚风格浓厚^④。

在江汉地区后石家河文化有类似的透雕玉器，在石家河遗址谭家岭地点^④和钟祥六合遗址^④均有发现。神兽的拟人化在后家河文化中也备受重视。肖家屋脊瓮棺W6出土的W6:32非常典型，头戴三角形冠，似为“介”字冠的另一种表现方式，“臣”字目，目两侧有飞翼向后上方展开，蒜头鼻，双耳佩环，口中吐出四颗獠牙^④。

在西北地区，近年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的皇城台地点，发现大量石刻，同样以“鸟负神兽”主题，并也表现出对神兽拟人化的重视，在一石柱的两面雕刻了两个神兽拟人头像。此外，皇城台附近还出土大量陶鹰，是对神鸟的表现^④。

鸟负神兽主题的流传，有力证明良渚早期国家解体后，并非如同一个误入过分崇尚宗教迷途的失败者黯然退出“最初的中国”的文明化进程，而是对各地区产生了深刻影响。陶寺早期国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早有学者讨论过陶寺社会复杂化与大汶口晚期、龙山文化影响的关系^④。山东临淄焦家遗址墓葬中，可见陶寺墓葬流行的玉钺钻孔内填入钻芯这样的玉器制作、使用细节以及毁墓等特殊葬俗的滥觞^④。西朱封^④和尹家城等^④遗址的龙山文化大型墓葬与陶寺大型墓葬^④更是有着很多相似性。两地的丧葬仪式均以宴饮为中心，随葬饮食器具和猪等，这是海岱地区自大汶口文化时期即形成的传统。两地同样随葬石钺、弓矢等武器，这也是

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传统。两地重要的相同因素还包括鼉鼓和绿松石镶嵌手镯等。

陶寺墓葬虽然在随葬成对的大口罐和灶等习俗方面继承了西坡墓地^④为代表的庙底沟类型传统，但整体而言与庙底沟类型和随后的庙底沟二期墓葬表现出的薄葬传统迥然有别^④。这样的随葬丰厚的成套饮食器具和武器以表达身份的“领导策略”应该是对东方传统的借鉴和发扬。由是观之，社会复杂化程度、遗址及墓葬规模在当时无出其右的陶寺早期国家的形成确实要用苏秉琦提出的“文明火炬接力”模式才能解读，但陶寺接过的火炬并非来自庙底沟类型传统和“大青山下罍与瓮”，而是来自前辈榜样良渚文化和同时期诸城林立的海岱龙山文化。

苏秉琦首倡的无先进中心引领的文化互动，以及“火炬接力”式的文明因素传承演变是解读中国文明起源壮阔历程的两个基点。认为各地区文化发展“离不开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启发”的中心引领观点^④和认为二里头文化的形成是“西风东渐”形势下的“断裂”式横空出世的观点都偏离了这两个基点，并不符合中国文明形成的实际^④。本文的讨论不会使这两个基点发生丝毫动摇，而只是强调应该坚持在整个“最初的中国”范围内观察这样的互动和传承。中国文明的“直根系”并不只生长于“面向内陆的西北地区”，也生长在“面向海洋的”东南部地区。“华山玫瑰燕山龙”碰撞的同时，在“最初的中国”范围内还发生着更广泛的交流互动，“良渚琮璧海岱城”才是催生“汾河岸旁磬和鼓”的更主要的动力。

注释：

①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②张忠培、俞伟超：《〈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

籍出版社,1994年。

③何努:《中国文明起源考古探索的新思考》,《从考古到史学研究之路——尹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④安志敏:《论环渤海的史前文化——兼评“区系”观点》,《考古》1993年第7期。

⑤安志敏:《三十年来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

⑥夏鼐:《碳十四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⑦李新伟:《中国史前文化格局构建的心路历程》,《考古学研究》(九),文物出版社,2012年。

⑧苏秉琦:《在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中国考古学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摘要)》,《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1997年。相关论述见104~106页。

⑩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1959年第10期。

⑪石兴邦:《黄河流域原始社会考古研究上的若干问题》,《考古》1959年第10期。

⑫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⑬Chang, Kwang-chih.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fourth e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⑭李新伟:《“最初的中国”的考古学认定》,《考古》2016年第3期。

⑮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

⑯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考古》2008年第3期。

⑰南京博物院、张家港博物馆:《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 M91 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10年第6期。

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荆门龙王山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8年第4期。

⑲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文物出版社,2012年。

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灵宝西坡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

㉑李新伟:《“彩陶中国”的重新思考》,《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㉒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文物》2009年第3期。

㉓李新伟:《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文物》2015年第4期

㉔李新伟:《红山文化的位置》,《红山文化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年。

㉕李新伟:《仪式圣地的兴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㉖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垣曲盆地聚落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本时期聚落情况见第三章第二节《仰韶文化中后期聚落形态考察》,第263~277页。

㉗许永杰:《距今五千年前后文化迁徙现象初探》,《考古学报》2010年第2期。

㉘杜金鹏:《试论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考古》1992年第2期。

㉙张弛:《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

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博物馆、沙洋县文物管理所:《湖北沙洋县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王家塆墓地》,《考古》2019年第7期。

㉛孟原召:《屈家岭文化的北渐》,《华夏考古》2011年第3期。

㉜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文物出版社,2005年。

㉝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18年。

㉞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文物出版社,2005年。

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文物出版社,2003年。

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考古调查》,《考古》2015年第1期。

㊲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

㊳a.南京博物院:《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试掘》,《考古》1981年3期;b.南京博物院:《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第2期;c.陈丽华:《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物》,

《文物》1984年第2期;d.江苏省寺墩考古队:《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第四、第五次发掘》,《东方文明之光》,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③韩建业:《论雪山一期文化》,《华夏考古》2003年第4期。

④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子沟与大坝沟——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

④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准格尔旗寨子塔遗址》,《内蒙古考古文集》(第2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④包头市文物管理所:《内蒙古大青山西段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6年第6期。

④方向明:《新石器时代最早的玉“神面”——凌家滩玉版》,《东南文化》2013年第2期。

④a.方向明:《凌家滩玉文化的东渐与良渚文化早期玉器》,《玉魄国魂: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五)》,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b.田名利、甘恢元:《凌家滩文化与崧泽——良渚文化玉器的初步认识》,《玉魄国魂: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

④吴卫红:《辨识薛家岗与良渚的文化交流——兼论皖江通道与太湖南道问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④黄建秋:《良渚文化分布区以外的史前玉琮研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④朱乃诚:《素雅精致、陇西生辉——齐家文化玉器概论》,《玉泽陇西——齐家文化玉器》,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5年。

④李新伟:《良渚文化神徽再研究》,《文物》待刊。

④刘敦愿:《记两城镇遗址发现的两件石器》,《考古》1972年第4期。

④邓淑苹:《论雕有东夷系纹饰的有刃玉器(上)》,《故宫学术季刊》1999年16-3期。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临朐西朱封:山东龙山文化墓葬的发掘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18年。

④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遗址2015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6年第1期。

④荆州地区博物馆、钟祥县博物馆:《钟祥六合

遗址》,《江汉考古》1987年第2期。

④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石家河考古队:《天门石家河考古报告之一: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孙周勇、邵晶等:《石岭遗址2018年考古纪事》,《中国文物报》2019年8月23日。

④栾丰实:《简论晋南地区龙山时代的玉器》,《文物》2013年第3期。

④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济南市章丘区城子崖遗址博物馆:《济南市章丘区焦家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18年7期。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临朐西朱封:山东龙山文化墓葬的发掘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18年。

④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灵宝西坡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

④张弛:《社会权力的起源:中国史前葬仪中的社会与观念》,文物出版社,2015年。

④韩建业:《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考古》2012年第3期。

④许宏:《“连续”中的“断裂”——关于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思考》,《文物》2001年第2期。

(责任编辑:周广明)